

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

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

CHINA'S RISE AND THE TRANSITION OF EAST ASIA ORDER:
SHAPING AND EXPANDING THE SHARED INTERESTS

阮宗泽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

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

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

CHINA'S RISE AND THE TRANSITION OF EAST ASIA ORDER:
SHAPING AND EXPANDING THE SHARED INTERESTS

阮宗泽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序

东亚和中东是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两个地区。国际社会对中东关心的是这个地区何时能真正安定下来,而对东亚关注的是这个地区多久将实现全面腾飞。

在 17 世纪以前,东亚各国基本处于封建时期,中国是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深刻影响着周边广大地区。此后东亚经历了两次大的质变。一次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除日本和泰国外,东亚各国都成了欧美的殖民地,中国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起来,不仅避免了陷入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参与了西方对东亚地区的抢占和争夺。对整个东亚来说,这是最悲惨的一段历史。另一次是二战后,东亚各国经过不屈不挠的民族独立斗争,纷纷实现了国家独立,东亚人民从此由黑暗走向光明。当前东亚正在经历的变化,则是一次更加宏伟、更加壮观的质的飞跃。从 20 世纪后半

叶开始,东亚各地先后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首先是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后有“四小龙”,接着是中国和东盟诸国。近十多年来,东亚一直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在此基础上,具有东亚特色的一体化进程正步入轨道。

这次变化的意义十分深远。纵观世界近三百年的历史,欧美国家长期垄断着国际舞台,在亚洲也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曾借口驱赶欧美势力,鼓吹“大东亚共荣”,真正意图只不过是妄想以本国取代欧美统治亚洲,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东亚地区拥有将近 20 亿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区域从政治独立到经济振兴、从区域合作发展到共同体的趋向,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程。战后东亚各国的独立业已改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而这次巨大变化将会重塑整个世界秩序。随着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新兴,“亚洲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欧美不同,东亚的兴起不是依靠对外扩张和掠夺,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借助经济全球化框架内的多方面互利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更具有典型意义。中国与东亚的和平发展是世界发展史上的新现象、新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阮宗泽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和研究员,享受政府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学者。他常年从事美欧问题和大国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又着眼于亚洲问题的研究。他撰写的《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一书,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捕捉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从国际秩序变革的角度提出了东亚国际秩序“和平转型”以及“共有利益”在这一转型中起关键作用的论断,并就此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颇有些独特见解和新意。对于观察和认识东亚当前的变化与影响,这不失为一本具有价值的参考书。

阮宗泽与我相识多年。他善于独立思考,做学问踏实,学风比较正派。他这本书不是追风逐浪之作,故为之序。

马振岗

2006 年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为何要研究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	/ 1
第二节 国内外如何看待中国与东亚的关系	/ 1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47
第四节 结构安排	/ 51
第一章 国际秩序的转型分析	/ 53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53
第二节 国际秩序的转型	/ 71
第三节 国际秩序转型的特点	/ 75
第四节 东亚秩序转型层次分析	/ 78
第五节 小结	/ 82
第二章 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	/ 84
第一节 权力与国际秩序	/ 85
第二节 制度与国际秩序	/ 91
第三节 身份与国际秩序	/ 98
第四节 理论缺失	/ 101
第五节 小结	/ 105
第三章 共有利益	/ 106
第一节 理解要素	/ 106
第二节 关键变量	/ 113
第三节 塑造与拓展	/ 115
第四节 价值与局限	/ 118

第五节 案例分析:中国与东盟	/ 121
第六节 小结	/ 139
第四章 未来东亚秩序探讨	/ 141
第一节 权威秩序	/ 141
第二节 碎片秩序	/ 145
第三节 均势秩序	/ 148
第四节 认同秩序	/ 153
第五节 多边主义秩序	/ 159
第六节 小结	/ 163
第五章 影响东亚秩序的变量	/ 165
第一节 全球性体系的形成	/ 166
第二节 对全球化的逆动	/ 169
第三节 日本角色的嬗变	/ 174
第四节 谋求“政治脱缰”	/ 180
第五节 中日关系转型之痛	/ 191
第六节 小结	/ 199
第六章 布什政府的国际秩序观	/ 201
第一节 “单极世界”拥抱者	/ 202
第二节 扬起“新帝国”的风帆	/ 209
第三节 “整合”外交	/ 220
第四节 重点转向亚洲	/ 224
第五节 中美如何相处	/ 228
第六节 重审“日本影子”	/ 239
第七节 小结	/ 245
第七章 朝鲜半岛形势与东北亚和平机制	/ 247
第一节 朝核风云再起	/ 247
第二节 六方会谈迎难而上	/ 253
第三节 各方立场	/ 260
第四节 未来东北亚和平机制	/ 268
第五节 小结	/ 272

第八章 国际秩序的中国视角	/ 273
第一节 “和合”秩序观	/ 274
第二节 防御性与包容性	/ 276
第三节 和谐世界	/ 283
第四节 打造软实力	/ 287
第五节 国家形象的塑造	/ 293
第六节 参与国际组织	/ 297
第七节 小结	/ 303
第九章 推进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	/ 305
第一节 塑造与拓展“共有利益”	/ 305
第二节 加强制度建设	/ 308
第三节 维护东盟“驾驶员”地位	/ 311
第四节 提高中日韩合作的机制化与实效	/ 313
第五节 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 317
第六节 小结	/ 322
主要参考文献	/ 323
后 记	/ 328

导 论

第一节 为何要研究中国崛起与 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

本书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推进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世界斗转星移，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体系瓦解、东亚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巴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印度洋大海啸、“卡特里娜”飓风、禽流感等国际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所有这些均表明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嬗变，全球国际力量正在出现新的转换与调整。任何一次国际体系的根本性变动，都会伴随着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刚刚过去的20世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就“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战结束，是大灾难时期；紧

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黄金时期；从 80 年代起则进入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彷徨不定仍在继续。^①

有的学者看到，“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之时，在两个时代之间可能有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②。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正酝酿着新时代的特质。因为“新世界是在旧世界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而且“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降生是正在缩小的同一世界之中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我们着重关注的是在旧世界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时代”^③。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而且任何一种国际秩序本身也是不断发展演变、不断增加新内涵的。

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众说纷纭，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平与发展”论，等等。有的学者还认为，今天的世界可以划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④ 尽管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世界处于一个新旧秩序的转型期。当然，这个转型期并不会一帆风顺，也可能是矛盾的高发期。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转换通常具有革命性和突发性，大规模战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标志，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往往伴随着动荡不安。今天国际秩序再次处于一个转换的十字路口，如何重建稳定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同样，如何在东亚建构一个稳定和平的新国际秩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

①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9 页。

②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 页。

③ 同上书，第 28 页。

④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21st Century* (Atlantic Books, London, 2003), pp. 16—37.

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①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考察人类文明的进化时曾说过:“看起来文明好像是通过活力而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通过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而这样一种生长过程有内外两个方面。在宏观世界里,生长的本身好像是一个对外部环境的逐步占有的力量;而在微观世界里,却又像是一个逐步自决或逐步自己进行调整的力量。从这两种现象看来,我们都有可能衡量活力本身的进展。”^②原有的国际体系失衡使国际秩序出现转换。转换或转型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风险,当然也意味着机遇,因此研究国际秩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种国际体系的巨变也同样深刻地冲击着东亚的国际秩序。东亚主要是指东北亚和东南亚 15 个国家。由于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该地区自 19 世纪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和争夺的对象;在 20 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对抗和冲突的高发地带。尽管东亚区域内还存在种种战略冲突、历史恩怨、领土争端、资源纠纷,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形成了日趋紧密的优势互补、相互依赖,以合作代替对抗。再者,东亚国家地缘相邻,习俗相近,风物互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那场突如其来的、惊心动魄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更是对全球化的残酷无情感受深刻。这促使东亚国家加快地区整合的步伐,东亚一体化和区域化蓬勃发展,和平与繁荣成为高端追求。

一、中国与东亚的互动

本书研究的主体是中国。中国是东亚的中国,因此将重点讨论中国与东亚的互动关系,体现中国视角。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周边,特别是东亚地区。如何重新界定或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中国与东亚秩序之间的关系被提上了日程。

①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乙种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6 页。

②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9 页。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 22000 多公里,海岸线 18000 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 29 个,其中直接接壤的邻国就有 14 个,这是中国的天然资源。东亚是中国最为关键的周边板块之一,也是世界主要大国利益的交汇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集中于此。该地区既是中、美、俄、日等几大国的利益汇聚之地,也是东盟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力量的成长之区。冷战时期这里就曾形成不少“热点”问题,有的坚冰至今尚未消融。各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发展水平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地缘战略关系也极复杂,可以说,东亚是整个国际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微缩景观。

冷战结束,宣告了大国对抗时代的终结,为中国进一步稳定周边的和平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逐步与东盟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0 年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建交;1991 年与文莱建交;1992 年和韩国建交。在此期间,中国又同越南、蒙古先后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相继同独联体国家建交,特别是同与中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还不失时机地解决了一些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俄边界的最终确定颇具战略意义。始于 1964 年的中苏边界谈判,直到 1992 年才解决东段边界问题,1994 年又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2004 年 10 月,普京总统访华,签署了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补充协议,标志着中俄 4300 公里的边界划界全部解决。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也得到顺利解决。1999 年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中塔国界协定,部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1999 年以来中国和越南先后解决了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及相关的渔业问题。中国还与一些接壤国家如印度等建立信任措施,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定,提高两国边界谈判的级别。1989 年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作为中国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基本原则。从稳定大局出发,中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在坚持主权属中方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下,尽可能和有关国家达成共识,减少了因领土争端而导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共同勘探南海已经启动。2005 年 3 月 14 日,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开启了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篇章。中国和东盟各方在2002年11月4日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政治上看,周边是中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中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中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经济上看,周边是中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从安全上看,周边是中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中国国内形势和发展战略有直接的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周边动荡不安,则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干扰。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亚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抓住并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将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秩序建构置于一个地区构造的进程中来考察,不仅涉及全球形势的变化,也涉及本地区的区域整合。中国的和平发展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东亚和平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东亚是关系到中国崛起的首要地区。东亚地区合作在未来中国所处环境构造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创建一个最近的、最直接的区域市场,使中国经济有一个稳定的战略依托,对于拓展贸易和投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区域政治和安全环境。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同处在一个合作机制之内,可以为两国真正改善关系奠定基础。第三,有助于建立亚太地区更加平衡的关系。只有东亚地区发展形成紧密的带有制度化建设的合作机制或组织,才能建立比较平衡的“太平洋关系”,即东亚和北美之间

的比较平衡的关系。^①

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从近代史上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并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对未来东亚秩序的形成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怎么看?东亚国家会作何反应?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反映的主要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命运的筹划和预期;但是东亚更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可能给该地区国际秩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落差。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大国的兴起必将对地区或世界格局带来重大冲击,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重新分配,导致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或地区力量的失衡甚至诱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兴大国选择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必然伴随着战争与流血,最终走向失败。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和平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能否吸取历史上其他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前者是指中国的战略方针、政策意图与国家意志;后者包括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如其他力量对中国崛起的认同程度有多大,以及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应对战略、战术或政策,等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受内部因素的制约外,还取决于与外界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对外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国家的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尽可能形成良性互动,以减少阻力。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东亚秩序会产生什么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在考察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时,中国既是施动者,也是“受众”。同样,东亚既是“受众”,也是施动者。换言之,中国既是东亚秩序的营造者、构筑者或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要受到东亚秩序的规范和制约。这种制约也是提供行为可预见性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展示受制约者的遵守游戏规则的道德。因此,即使受“规范”也并非全是负面的。中国现在需

^① 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洲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要在改革与开放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内部建设为核心,在施动者和受众角色之间寻求平衡。

(一) 三大转型

在这里主要考察三个大的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二是东亚的转型,三是中国与东亚秩序关系的转型。其中,中国的转型最具有全局性意义。

中国的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近代以来大多数时候是由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历史处境的变迁来塑造的,可以说是“通过外界来帮我们形成的。比如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边疆危机,缅甸走了,越南走了,中国的现代边疆意识确立了起来。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进来,使得中国人的认同意识抬头……中国人真正有全国意识还是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残酷地镇压导致‘你们’、‘我们’的意识出来了,到 1945 年中国人就有了真正的近代世界意义上的认同”^①。而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与东亚紧密联系,这使中国面临新的一次认同的培育与界定问题。在新的背景下,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问题。这一认同与近代以来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仅靠外界的影响来确定,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作用。

从中国方面看,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标志,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现代化道路,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型期。

中国的崛起是一重要事态。美国的《新闻周刊》在 2005 年 5 月一期以“中国世纪”为题作长篇报道。该报道说:“过去 400 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着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一个主要强国面临一个正在崛

^① 金灿荣:《没有解决的国家定位——兼论 21 世纪中国国家定位的五大因素》,《中国与世界观察》2005 年第 1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82 页。

起的强国的挑战时,两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双方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将决定它们的未来关系,并将影响到世界和平。”^①有学者认为:“中国远非该地区唯一重要的大国,但是它想要扮演更大角色的愿望却已经成为塑造亚洲新秩序的主要催化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多边机构的重新评估、要求取消联盟、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等为中国采取与亚洲接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中国新的地区姿态建立在以下四根支柱基础上:一是参与地区组织,加深了对外交方面的规范和‘软力量’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深化双边关系,与邻国之间开展一系列会晤和交流;三是扩展地区经济联系,中国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正迅速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四是减少安全领域中的不信任与担忧。”^②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逐步改善;经济发展的开放性日益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拉动力不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包括近两年来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在全国农村免除农业税并稳步推进综合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资本市场的改革顺利推进;国内外广为关注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实施等。中国在2005年底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争取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为此,将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③

历史上,中国与周边自然形成一个由多种关系维系交织组成的广大区域,如由地缘环境、领土、领海等形成的“天然”邻邦关系。东亚国家多

① Fareed Zakaria, “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 *The Newsweek*, May 9, 2005.

②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Winter 2004/2005.

③ 温家宝:《中法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人民日报》2005年12月6日。

种多样:大小、强弱、贫富各异,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各种文化、宗教、民族汇聚。从历史发展的经纬看,该地区曾经出现过多种秩序。从经济方面看,历史上中国曾作为该地区经济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客观上形成了一特定的经济区,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合作的辐射圈。现有的区域合作是在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于区域合作。中国作为一个特大市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竞争力的增强与东亚经济圈的出现互为依存。与经济结构相对应,东亚的国际体系在政治上也一直存在着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三重结构。^①

从层次结构看,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公认的,尽管早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均等的,却维持了东亚地区一种长期的和平秩序。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是东亚秩序的长期塑造者。19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欧洲列强和殖民主义的闯入,打破了东亚地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正是这种“朝贡体系”使东亚首先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世界。随着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先后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开了门户,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孤立发展的时代结束了,纳入了发端于西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从18世纪到19世纪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使这一秩序遭受冲击而解体,东亚处于混乱状态。特别是中国被迫与西方殖民者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其标志是1840年后中国被迫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朝贡体系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条约体系”^②。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国际法和权力政治基础上的近代国际秩序。

这一体系的变更也与日本角色的转换密切相关。19世纪末,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崛起,东亚地区开始了一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这期间日本成为东亚秩序的挑战者、颠覆者,同时也是新的塑造者。结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4—327页。

② 这些条约包括:1842年8月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3年10月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4年7月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5年7月与比利时交换了关于贸易的备忘录,1847年3月与挪威缔结了通商条约等。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336—337页。

果日本给东亚各国带来了一场浩劫。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和日本的狂胜,使得东亚国际体系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东亚国际体系由过去一直以中国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日本趁机开始在东亚大力拓展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体系,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推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并在这一幌子下开始了向东亚国家的军事扩展行动。这对东亚世界无论是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政治结构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

可以这样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远东各国特别是中国被逐渐纳入欧洲主宰的国际社会。同欧洲国际政治一样,远东国际政治当然也是一种强权政治,其表征是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所谓条约体系。以通商口岸贸易、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为内容的条约体系为中外关系乃至整个远东国际关系提供了所谓的“秩序”,西方主要列强大都参与了这一秩序的编排。中日甲午战争后,条约体系下的强权政治又以极端的“帝国主义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东亚地区变得支离破碎,维系这一地区的传统的“宣德于外”的秩序观荡然无存。

反观中国,其角色几经变换,从中心到边缘,从主动到被动,又从消极卷入到积极参与,中国与东亚秩序的互动构成一幅东亚沉浮、变幻的历史画卷。20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的邻国大多是日本、英国、法国或美国的殖民地。20世纪中期,中国经历百年沧桑之后,开始了民族复兴与现代化进程,日益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强劲的复兴趋势已经加快东亚地区国家间利益的调整,而现实要求中国在不断调整的利益关系框架中逐步确立独特的位置,中国与东亚关系又迎来了一个相互建构的历史性机遇。

(二) 东亚的“自我伸张”

20世纪后期起,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东亚的发展已经使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升。21世纪亚洲的进步将是人类社会谱写得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篇章之一。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20世纪90年代中就曾认为:“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不论对亚洲还是对全球而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341页。